

# 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

## ——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

郁龙余, 李朗宁

(深圳大学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当下, 正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存在三大问题: 缺乏明确的学科目标, 受西方中心论束缚, 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其发展思路是: 以大国学术应有的胸怀, 将中国史诗研究纳入国际大视野, 明确其前进目标; 自觉以印度史诗学为参照, 实现中印史诗研究互动; 更新思维, 与时俱进, 用发展的、整体的观念指导研究全过程。

**关键词:** 中国史诗; 研究现状; 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 I 2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08)02-0102-05

当下, 中国史诗研究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学术振兴产生巨大促进作用。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发生、发展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 并对其前进目标、发展策略作出自己的探索。

### 一、中国史诗研究的发生与发展

中国史诗研究滥觞于民俗研究, 至今已有 80 多年。但相对于神话学、故事学的研究, 史诗研究的真正起步较晚, 一般认为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二、三十年为“资料学取向”期, 后二、三十年进入“学科取向”期。“前一种取向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 后一种则显示出批判地吸纳西方史诗学的取向。”<sup>[1]</sup>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史诗研究出现了提速的势头。在这 20 多年中, 无论是少数民族史诗, 还是汉族史诗, 其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以 2004 年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各类学术期刊共发表史诗研究论文近 50 篇,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格萨尔》全方位的研究与考证; 其次是其他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及史诗方法论的探讨。在研究视野上, 大多通过史诗内容与

史诗人物的追根溯源, 探寻史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在方法上, 部分文章以个案为例, 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 进行深入考证<sup>[2]</sup>。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一批史诗研究的新秀, 他们对中国史诗研究和西方史诗研究采取分析的态度, 勇于继承和批判, 将史诗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彝族青年学者巴莫曲布嫫, 结合具体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全过程, 对“演述场域”进行深入思考, 探讨建立以“五个在场”为要素的田野工作模型<sup>[3]</sup>。这样, 在方法层面、具体操作、研究视野、田野文本与学术表述、演述场域的确定等方面, 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史诗特别是对史诗异文的研究。

一般认为,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分南方史诗和北方史诗两类。近年, 有学者从南方史诗中分出“迁徙史诗”。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亚类型史诗, 如“洪水史诗”。仅彝族史诗中, 洪水史诗就有十多种, 所以钟敬文认为: “洪水史诗”可以成为南方史诗这一大类型下的小类型, 在方法上也可以借鉴洪水神话研究中的故事母题方法。<sup>[4]</sup>总而言之,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自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取得了长足

收稿日期: 2007-05-29

作者简介: 郁龙余(1946—), 男, 上海人, 深圳大学教授、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印度文学、印度文化及中印文学、诗学比较研究; 李朗宁(1982—), 女, 广东湛江人, 深圳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进步。不但推翻了西方学者的中国无史诗的错误认定,而且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世界地位。例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认为“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等许多优秀史诗一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sup>[14]</sup>

在众多中国无史诗论中,黑格尔的影响最大。他在论及东方史诗时,坚决地认为只有印度和波斯才能看到真正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种大障碍。”<sup>[15]</sup>黑格尔见到的中国材料主要是法国传教士提供的,其局限性可想而知。这种由资料局限造成的武断,助长了西方人的自我中心论,并且和中国人盲目的文化自卑相作用,对中国史诗研究有很大消极作用。

汉族史诗研究受到的禁锢更甚。对这种禁锢的正面突破始于对周族史诗的成功研究。陆侃如、冯沅君写于1925年至1930年的《中国诗史》,肯定中国汉族有史诗:“尤其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及《大明》五篇。……把这几篇合起来,可成一部虽不很长而亦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sup>[16]</sup>。这个观点,后来被不少学者所接受。美籍华人学者王靖献认为:“在《诗经》诸篇中,一系列史诗事件含有开创神话(a creation myth),还含有关于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的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Weniad)。”<sup>[17]</sup>《英雄主义》,载《从仪式到寓托》,香港,1988)“‘文王史诗’既是诗歌叙述,同时又是百科全书,旨在通过记录开国者的事迹,为周代社会建立永久的名声和精神气质。”<sup>[18]</sup>(《史诗》,出处同上)周发祥认为:王靖献“在严格使用史诗定义时,又从语言、哲学、思想、宗教等文化层次提出问题,深化了对史诗的理解。”<sup>[19]</sup>1998年,张松如、郭杰出版《周族史诗研究》一书,不但肯定了《诗经·大雅》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的史诗地位,而且认为“《七月》、《文王》、《文王有声》三篇,其写法虽称不上史诗,其内容却颇有足以与史诗相互参证者。”<sup>[20]</sup>(P243)“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我国最早出现的史诗。如商颂《玄鸟》……”<sup>[21]</sup>(P134)对周族史诗的肯定,得到中国多数学者的支持,章培恒、骆玉明

的《中国文学史》说:“《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以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sup>[22]</sup>《中华儒学通典》对上述《大雅》五首诗的编者按语皆为“周族史诗”<sup>[23]</sup>。

汉族史诗研究的另一大成绩,是用史诗的精神和视角来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叙事文学。邱强、胡吉省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是英雄故事产生的土壤,和《奥德修》、《摩衍那》一样,“《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英雄的辉煌而悲惨的结局也是人们对历史巨变的一种无奈和情感的无所寄托。因此,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从重塑历史英雄开始,抒发了中国文化的无所归依的悲凉,具有史诗精神。”<sup>[24]</sup>认为:“早期章回小说实际上杂糅历史、传奇与神魔三种因素,活跃于乱世传奇中的英雄大都赋予了扰乱宇宙秩序的魔怪化特征,英雄史诗的因素甚至直接支配了小说的潜在结构。”<sup>[25]</sup>

## 二、中国史诗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快速进步的同时,中国史诗研究存在若干不足,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一)中国史诗研究缺乏明确的学科发展目标。当年欧洲学者在研究《奥德修》和《伊利亚特》时,充满自豪感。当他们发现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王书》以及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摩衍那》时,也充满积极的主动精神。正是他们对东方史诗研究的丰硕成果,奠定了东方学的重要基石。二战之后,西方学术界的勃勃生气大不如昔,对中国史诗的研究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肩上。但是,中国学者并非都处在一种应有的学术自觉状态,花了二、三十年时间搞资料,整理方法也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一时期研究成绩虽然显著,但许多人的初衷仅是为了打破西方人的中国无史诗论;而对中国史诗学的构建缺乏宏观的整体的战略把握,对中国史诗研究在世界史诗学中的应有地位,也缺乏必要考量。中国史诗研究表现为缺乏大国学术应有的胸怀和自主性,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和汉族史诗研究,总是两张皮,处于油与水的分离状态。

(二)中国史诗研究受西方中心论束缚严重。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治上站起来了,但许多人依然受着西方中心论的统治,“贾桂思想”严重。在“资料学取向”期,彻底抵制西方史诗学,关起

门来自己搞资料搜集整理,其实恰恰深受其害。世界上的事只要一关门,只要一彻底,就陷入盲目性,一定出问题。我们摒弃的、抵制的只能是西方史诗学中的谬误,而不应是整个西方史诗学。在“资料学取向”期,由于缺乏科学学理的指导,虽然在田野作业时怀着一股爱国热情来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却不知不觉地让史诗的原生态受到了损害,以至成为令人无法挽回的心头之痛。

近二、三十年来的“学科取向”期,无疑是对“资料学取向”期的继承与发展,研究步入了开放、正规和快速的轨道。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带着问题发展的。当下中国史诗研究对西方史诗学缺乏分析,囫圇吞枣,判断与批判不够,甚至奉为神圣。有学者指出,“我国北方史诗研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视西方为某种‘圭臬’,也就是说以英雄史诗为主要研究对象。”<sup>[1]</sup>其实,南方史诗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三)中国史诗研究中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我们在《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中说:“研究比较诗学仅仅在A与B两者之间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第三者C,即我们称之为‘第三者原则’。”并强调“这个‘第三者原则’,是比较诗学的最低纲领。”<sup>[2]</sup>我们认为,中国史诗研究也离不开比较的方法。一切事物的形态与品德可以自我表达,但其外在价值必须通过他者来表达,即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得以显示与实现。在没有西方史诗参照之前,我们对中国史诗一直以民间叙事诗来对待。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学者将史诗作为“民间叙事诗”的组成部分,说:“篇幅宏伟在民族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民间叙事诗习惯上称谓‘史诗’。”<sup>[3]</sup>由此看来,和诗学研究一样,中国史诗研究除了希腊史诗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印度史诗做参照。

中国史诗研究,虽然不少学者也在提到印度史诗,但由于译本后出的原因,印度两大史诗尤其是《摩诃婆罗多》作为必要的参照,实际上长期处于缺位状况。现在,继季羨林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摩衍那》全本诗体汉译之后,2005年底由黄宝生主持的《摩诃婆罗多》全文散文体汉译本问世,使中国史诗研究在文本上具备了必不可少的印度参照。

### 三、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思路

当下,中国史诗研究经过艰难探索,进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全佳境。所谓天时,中国在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正迎来民族文化复兴的黎

明,我们的大国地位正在全面确立。所谓地利,中华大地上蕴藏着丰富的史诗文化资源,同时还有着希腊、印度及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史诗的可靠译本。所谓人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培养,我们拥有一支业务好、责任心强、老中青年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面对大好形势,中国史诗研究应怎样发展呢?

其一,以大国学术应有的气概和胸怀,将中国史诗研究纳入应有的国际大视野,明确其前进目标。

世界史诗学史走过了欧洲时代和印度时代,正向第三个阶段——中国时代迈进。这是我们应有的国际视野和学术责任。任何一个学科时代的到来,都有其必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以比较文学为例,一般认为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其实我国藏族学者在十三世纪就译介印度诗学著作《诗镜》,开始了历时7个世纪的中印文学比较、诗学比较之旅。但是,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比较文学,到20世纪初才在我国逐步建立。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的中国学派的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人正式提出<sup>[4]</sup>,至今尚在建设之中。然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时代的到来已成不争的事实。

建立世界史诗学中国学派的客观条件,除了学理上的逻辑合理性之外,史诗资源的大国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当下中国史诗研究所呈现的兴旺景象,正是其生动体现。

从史诗资源大国到史诗研究强国,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需要中国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不懈的研究及丰硕成果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将“学科取向”阶段从“整理内务”(钟敬文语)推向更高层次,建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从一个史诗的资源大国,发展为研究大国,进而成为研究强国,为丰富、完善世界史诗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自觉地以印度史诗学为必要的参照,将中印史诗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互动中前进。

在世界史诗学史上,欧洲时代以研究《奥德修》和《伊利亚特》为主要课题,是世界史诗学的奠基阶段。到19世纪,随着印度两大史诗的发现以及研究的深入,渐渐进入印度时代,这是世界史诗学的发展阶段。

世界史诗学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并非一帆风顺。不管是西方还是印度,都有人怀疑《摩诃婆罗多》和《摩衍那》的史诗身份。德国印度学家赫尔曼·奥尔登柏格认为:“最初的《摩诃婆罗多》,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史诗故事,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它却成



了极其混乱的大杂烩。”为此,印度学者苏克坦卡尔说:“我们的这部史诗,虽然一般被称作印度大史诗,却并不完全符合马修·阿诺尔德提出的一条定理,即‘史诗的主题必须是关于某一次伟大而复杂的行动’。”<sup>[19]</sup>(P127)被称为“纯粹印度土著”的罗默希·金德尔·都德,是位对《摩诃婆罗多》诚挚的崇拜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大史诗的庞大芜蔓是个缺陷。苏克坦卡尔指出:“都德显然为古希腊造型优美、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艺术品以及希腊史诗诗人的形式完美的创作所倾倒,因而不知不觉地把希腊的标准应用到一部印度的作品上,而他并没有认识到印度人与希腊人在理想上的根本不同之处,这种做法怎么说也是很冒失的。”<sup>[19]</sup>(P129)正是在各种争论中,印度史诗的庞大规模、大量插话、说教特性等等,逐步被各国学者所接受。

其三,更新思维,与时俱进,以发展的、整体的观念指导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全过程。

(1)打破少数民族史诗和汉族史诗研究各不相关的观念,运用影响比较、平行比较及文化人类学等一切有用的方法,从内容、形式、江山、物候、传播、哲学、宗教、历史、艺术、语言、审美等方面研究两者关系。我们不否认少数民族和汉族史诗的巨大差异,但毕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两者在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能在中国史诗的整体观念下研究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史诗,既注重两者的个性,又重视两者的共性,一定会使我们的研究出现新的景象。

(2)打破一成不变的原文论。在史诗文本收集和研究中,中外学者都追求原始文本,强调史诗原文的纯洁性。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沃什伯恩·霍普金斯和印度学者苏克坦卡尔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霍普金斯认为:《摩诃婆罗多》是“一个不是原文的原文,在每一次修订中都被扩大、改变。……它是在一个没有历史观念或不注意保护民间流传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国度产生的。在那里,任何吟诵者或抄写者都不受限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滥加溢美之词,在那里对敬爱的神进行赞美是件功德,每一件民间流传的诗直至今日都被人随意处置”<sup>[19]</sup>(P134)。这位美国学者将《摩诃婆罗多》的产生年代定在公元前400年,比印度许多学者认定的时间晚得多。苏克坦卡尔大为不满,称他的观点为“胡言乱语”,用的是“原子家式的研究方法”<sup>[19]</sup>(P133)。苏、霍之争都以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为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我们要用发展的观念,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史诗像河流又像森林,一年四季景不同,任

何文本都是“画图”与“照片”,都是真实的,但纪录的都只是一瞬。所以,巴莫提出的“五个在场”的观点,是对“演说场域”<sup>[19]</sup>的深入思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尊重发展变化的研究方法,值得中国史诗研究者提倡。当然,这种方法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3)既要突破欧洲观念,也要突破印度观念。在史诗研究史上,无论欧洲观念还是印度观念,都有其自身的深刻背景。面对中国史诗的实际,该突破的就突破,该借鉴的就借鉴,该坚持的就坚持。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欧洲学者的学术勇气。1997年,国际民俗学会主席劳里·航柯发表《史诗与认同表达》一文,表达了许多新观点。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倍感“荷马样板”是束缚,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源头活水。该文还援引约翰·威连幕·约森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sup>[19]</sup>

中国史诗研究同样不必局限于印度概念。但是一部分中国学者对中国超小规模 of 史诗,总是心存疑虑。正如巴莫所指出:“有学者认为南方英雄史诗只能称为‘英雄歌’或‘雏形英雄史诗’,因为篇幅不够宏大。”<sup>[19]</sup>对《诗经》中的周族史诗的确认,尽管从内涵和特征上做了充分论证,就是因其规模过于袖珍而难以接受。其实,事物分类归属的主要依据是内在特征,而不是外部特征。几十年来,我们大力反对西方中心论,要求我们的学者不要总是自以为非,在文化学术上看不起自己和祖宗,盲目跟着西方人跑。我们现在还要郑重提出,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还要反对狭隘的中华本位论。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一表现为自卑,一表现为自大,然而两者都以无知为基础。我们以平静之心肯下功夫,搞清楚了西方、印度和中国,就会同时鄙弃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所谓大国学术,应该是襟怀坦荡、公允求真、无私无执。这是研究中国史诗的每个学者都必须具备的品德和心态。惟此,我们才能从史诗资源大国走向史诗研究强国。

####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巴莫曲布嫫.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学建设[J].民族艺术,2002,(4).
- [2] 桑俊.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1).
- [3] 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说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J].文学评论,2004,(1).
- [4] 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藏族文学史(上)[M].成

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177.

[5]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170.

[6]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8.

[7] 傅璇琮等.中国诗学大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475.

[8] 张松如,郭杰.周族史诗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9]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86.

[10] 吴枫,宋一夫.中华儒学通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133-137.

[11] 李舜华.早期章回小说中的英雄史诗因素[J].贵州社会科学,2004,(3).

[12] 郁龙余等.中国印度诗学比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4575.

[13] 王德有,陈战国.中国文化百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340.

[14] 黄美序.究竟是谁最先敲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锣鼓[A].黄维樑、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3.

[15] [印]苏克坦卡尔.论《摩诃婆罗多》的意义[A].季羨林、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6] [芬兰]劳里·航柯.史诗与认同表达[J].孟慧英译.民族文学研究,2001,(2).

【责任编辑:向春】

# Proceeding from a Power of Epic Resources to a Power of Epic Researches: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pic Researches

YU Long-yu, LI Lang-ning  
(School of Arts,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 such three problems as lacking a clear-cut disciplinary target, being restrained by the Western ethnocentrism and the absence of a necessary reference frame by a third party in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epics when entering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researches is 1) to put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epics into the grand international orbit with a breadth of vision that a great power's learning should have so a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es' development target; 2) to conscientiously take India's poetics as China's frame of reference so as to effect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poetics and 3) to guide the whole research course with a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ntirety by innovating our thinking and keeping abreas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nese epic; researches' status-quo; development strategy